



集体化时期的 村庄典型政治

★ ★ ★ 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 ★ ★ ★

光梅红 / 著

VILLAGE'S MODEL POLITICS IN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集体化时期的 村庄典型政治

★ ★ ★ 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 ★ ★ ★

光梅红 / 著

VILLAGE'S MODEL POLITICS IN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光梅红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097-6709-2

I. ①集… II. ①光… III. ①农村-政治-研究-昔阳县
IV. ①D6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2793号

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
——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

著 者 / 光梅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浩敏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曹义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5 字数：253千字

版 次 /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709-2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

朱汉国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曾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村庄。大寨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穷山沟面貌，弘扬了集体主义。1964 年，大寨被中共中央树为全国艰苦奋斗的样板。随之，一场规模空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至 1980 年，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落下帷幕。大寨也由典型走向沉寂。

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结束 30 余年，但关于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议论，仍流传坊间。如何看待大寨的崛起？大寨何以能成为全国典型？如何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仍有不同的解读。

光梅红博士从河北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入北师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在商定论文选题时，她提出要研究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光梅红出生于山西昔阳。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研究家乡的大寨抱有浓厚的兴趣。选题确定后，她先后到昔阳县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深入昔阳、大寨进行实地调研，在掌握大量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对大寨典型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深入剖析，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本书是在光梅红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她在书中重点论述了如下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大寨模式。大寨在我国农村走向集体化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寨人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爱集体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大寨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二是大寨依靠国家政策和集体的力量，进行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等活动，改善了生产条件，集体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三是大寨的集体性的生活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大寨人开始实施住房、娱乐、卫生等公共事业，满足了村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诚然，在大寨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工副业生产居于次要地位，这又限制了大寨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大寨模式，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第二，如何认识大寨典型的塑造。在1964年底，大寨已是当地艰苦奋斗的典型。中共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在多种场合对大寨及其村支部书记陈永贵进行表扬，掀起学习陈永贵和比学赶帮超活动。1964年，大寨被中共中央树为全国农业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大寨被塑造成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强调学大寨“不能简单学生产经验，不能简单学表面现象”，而要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些地方甚至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口号。如何认识大寨典型的塑造和再塑造，探求其间的各种因素，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又一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大寨成为典型后的社会影响。大寨政治形象的多次塑造，给大寨生产和大寨人的生活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看，大寨成为全国的典型后，大寨人展开了一次“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讨论，这场讨论既对大寨人进行了道德教育，又使大寨人开动脑筋发展生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可以学习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使用良种和农业机械、改进施肥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大寨不断强化自己“革命”的一面，甚至将“穷过渡”“没收自留地”“关闭集市”等视为“革命”目标，使得大寨的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大发展，村民的生活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更严重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典型形象，大寨领导人在很多情况下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又损害了典型的形象。如何认识和

评估成为典型后的大寨，无疑也是需重新探讨的一个问题。

光梅红的《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一书，即要力图解读上述问题。毋庸讳言，光梅红的解读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商榷。但我认为，从学术的角度上而言，光梅红的贡献不在于她如何解读这些问题，而在于她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思考。

光梅红在学期间，虚心好学，对一些学术问题肯钻研。我期待她不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001
	二 学术史回顾	005
	三 研究思路	017
019	第一章 崛起前的大寨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	019
	第二节 人地关系	023
	第三节 村庄社会关系	025
	第四节 大寨的社会变迁	027
033	第二章 典型的孕育	
	第一节 大寨创造了生产奇迹	033
	第二节 大寨成为时代的楷模	044
	第三节 大寨证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050
058	第三章 典型的树立	
	第一节 从昔阳走向全省	058
	第二节 走向全国	067
081	第四章 典型的推广	
	第一节 典型推广的形式	081

	第二节	典型推广的成效	093
	第三节	典型经验推广的评价	098
105	第五章	典型的政治化	
	第一节	学大寨融入“文化大革命”	105
	第二节	典型经验的政治化	112
	第三节	政治化的典型经验推广	116
	第四节	政治化典型经验传播的成效	121
153	第六章	典型的祛偏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滞的农业生产	153
	第二节	中央的纠偏	156
	第三节	纠“左”的反复	163
168	第七章	典型的沉寂	
	第一节	现实状况	168
	第二节	思想解放	177
	第三节	承包制的再度兴起	194
	第四节	典型走向单干	199
204	第八章	典型的思考	
	第一节	典型模式	204
	第二节	典型的塑造	210
	第三节	典型人物	214
	第四节	典型政治与乡村社会	221
227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0	索 引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史学界一颗璀璨的星星。乡村史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多侧重于探究重大事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农村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表性的著作有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004、2005年版),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林蕴晖的《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勇的《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着眼于政策的制定执行或社会制度的变革对农村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少涉及农村社会成员对国家制度的反应。

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对这些事件重新进行研究,特别是一些博(硕)士生纷纷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存在,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代表性的著作

有：周晓红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中心 1998 年版）、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莒南土地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 2003 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王跃生的《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 世纪 30~90 年代的冀南农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存有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崆峒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钟霞的《集体化与东邵童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田锡全的《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和陈益元的《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刘庆乐的《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苗月霞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等等。其中，仅周晓红、张乐天、辛逸等从农民心理、外部冲击与村落传统互动、分配制度等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鉴于学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研究较薄弱的现状，笔者不揣浅陋，将影响中国农村长达十几年的农业典型大寨及学大寨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的感召激发了这个研究选题。笔者是昔阳人，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末期。从记事起，买东西要布票、粮票、肉票，家里案桌摆放着毛泽东塑像，书架上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墙壁上贴

着毛泽东画像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陈永贵的画，还有父母早出晚归地参加农业劳动、记工分，生产队分粮食，每天的饮食基本上以玉米面糊糊（俗称“撒”）、石条面（玉米面和黄豆面掺和做成的一种面食）和小米稀饭为主。这些零碎的记忆是幼小心灵对当时社会历史的片段留存。

脱胎懵懂年龄的初识，开始体察与感悟大寨。1992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大寨人逐渐懂得了自身所蕴含的品牌效应，以“大寨”命名的毛衫、酒、水泥、面粉、核桃露等产品不断问世，且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现象进一步引发笔者的思考：与昔阳县其他农村相比，大寨有何独特之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何大寨能更快地发展起来？它的优势在哪里？现实的感触使笔者对大寨的历史愈加感兴趣。特别是几年前大寨一游，映入眼帘的是已成为许多收藏者喜爱的毛泽东像章、塑像、选集、语录，灌入耳膜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还有以陈永贵等为代表的大寨人民战天斗地的故事，这再次缩短时空，将笔者拉回到那个岁月，与儿时的记忆产生了共鸣，于是当即买了秦怀录著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阅后对陈永贵时代的大寨农民既敬佩又难以理解，萌发了从历史学角度探究那段历史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直到笔者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之后，探究这段历史的愿望才以博士论文选题的形式实现。

2006年夏，笔者利用假期到昔阳县档案局查阅有关大寨的档案资料，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档案资料保存较为完整，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二）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张乐天所说，“在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和乡村企业的存在方式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概念。”^①大寨就是人民公社中的典型。

^①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5页。

典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透过对典型的研究可以折射特定时代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大寨大队难以作为学术研究的个案。^①但笔者认为，对大寨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和深化学术界对农村人民公社、农村“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生存图景具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序列，一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另一个是人民公社化运动。”^②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序列都有典型中的典型，前者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主要代表人物为李顺达和申纪兰。后者如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主要代表人物为陈永贵和郭风莲。西沟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佼佼者。它在战争年代积累的生产经验和社会关系使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提升到国家的层次，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典型中的典型。此时，大寨的情形是“潜龙在渊”，它的名声还未能超过当地的白羊峪村和刀把口村，更何况西沟村。但大寨领导者也在不断地努力改变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寨也逐渐地被县、地和省委发现和重点培养。它在20世纪60年代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性的典型。从1964年到1980年持续16年的学大寨运动同样体现了典型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大寨继西沟之后，成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对大寨的研究，为探讨特定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农民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其蕴含的社会价值对当代农村发展是一个有意义的借鉴。

如今，中国农村又走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2005年冬，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2006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如何因地制宜地确定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和形式？如何真正地发挥村庄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这些都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哲理告诉我们，大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农业和农村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①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3页。

② 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53页。

它的经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贵实践，对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颇有现实意义。

二 学术史回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日报》《新华月报》和《山西日报》等以社论、新闻报道（典型经验介绍、各级政府的号召、会议发言稿）以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美术等多种形式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赞颂。同时出版了多达上百种农业学大寨的图书。“文化大革命”前的报道基本属实，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作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心理的影响，报道和图书多缺少理性分析和论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赴大寨参观考察后，在政协会上尖锐地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①从此，大寨的盖子被揭开了，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至。各种报道和舆论又对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表现进行强烈指责，揭露学大寨对各地农村造成的各种恶果。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对大寨以及1964年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政治定性。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两个时期反差极大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农业学大寨时期的社会景象，但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偏颇性。因而，这两个时期对大寨的种种报道和出版物都称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学界开始反思集体化经济。部分省（市、区）相继整理出版了反映本省（市、区）的农业合作化史料，如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① 吴象：《大寨的盖子是如何揭开的》，《质量天地》1999年第1期，第27页。

年版)、王祝光主编的《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耕今主编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编撰的《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编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编辑委员会编的《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编写委员会编的《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于文贤主编的《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化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等编的《广东农业合作制文件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之,学术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围绕着《总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重新阐释和研究。李德彬、赵德馨、蒋家俊、柏福临等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或多或少地都涉猎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特别是赵德馨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村产生的影响。90年代初,孙启泰、熊志勇应“40年国是反思丛书”之邀,合著《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大量地利用了记者报道和调查报告资料,叙述了大寨红旗升起与坠落的全过程,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成为农业学大寨研究的开山之作。1994年10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委托郭延狄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第一批课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回顾”,并于1995年完成初稿,1997年10月结题。^①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大寨这个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绕不开的

^① 转引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第117页。

历史环节给予关注，出版了一些涉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著作。代表性著作有：武力和董辅初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各省农业卷、陈吉元等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温锐的《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农村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周志强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王玉贵、娄胜华合著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令人欣喜的是陈大斌的《大寨寓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和李静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相继出版，进一步促使我们理解大寨和大寨的典型意义。

此外，还有一批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品，如孔令贤的《大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大寨沧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秦怀录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映泉的《陈永贵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冯东书的《“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谭成健的《大寨：中国名村》（中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文红斌的《大寨人的豪言壮语》（香港笔会2004年版）、宋连生的《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春梅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家副总理》（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这些回忆录、传记、实录生动地再现了大寨及陈永贵的形象，丰富了我们对于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认识。

总之，从1980年至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国内学术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论题有如下五个。^①

^① 参见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第93～101页。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

1.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

山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向大寨学习的内容不同为界分成两个时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寨已经由一个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逐步变为一个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①

对此结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以孙启泰、熊志勇为代表，基本采用《总结》的观点。主张以中共十一届十一中全会或“文革”为断线，将运动一分为二，之前的为“学大寨，赶大寨”运动，之后的十几年为农业学大寨运动。^②周德中也认为“四清”和“文革”两个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本质性的区别，“四清”时的农业学大寨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文革”中的大寨则完全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政治化了。^③这个笼统的认识并无错，只是随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对于农业学大寨这一政治典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郑谦认为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明显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而纠“左”和落实政策的内容在“左”的外表上发展起来。^④张神根也认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扛着大寨红旗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偏差，抓农业政策的落实”。^⑤

经济学界以程漱兰为代表，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将农业学大寨置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模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下进行分析，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初兴（1964～1970年）、高潮（1970～1978年）、衰落（1978～1980年）三个阶段。^⑥

①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885页。

②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58页。

③ 周德中：《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40页。

④ 郑谦：《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9页。

⑤ 张神根：《1966年至1978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57页。

⑥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23～224页。

事实上，这两种分法都暗含着一个条件，那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农业学大寨，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史学界从运动发展进程本身分析，强调“文革”时期的大寨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并按其性质的变化分为两个时期。经济学界则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毛泽东针对干部侵占农民剩余的问题而提出阶级斗争，并贯穿于“文革”前后，按照固有体制能量发挥的程度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群众路线的实践运用。

2.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原因

学界认为，大寨红旗的升起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是着眼点略有差异。

张湛彬、吴象等从毛泽东构建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原因。张湛彬认为：“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着力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的典型，大寨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这个典型必须继承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又切实改变了贫穷面貌，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① 吴象指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和反修防修的重要性。^② 李静萍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粮食短缺的现实要求、反修防修的战略需要、集体经营的必然选择和奋斗精神的时代呼吁是大寨荣兴的基础。^③ 程漱兰认为大寨典型是集体化体制的理想境界。^④

晓晋分析了大寨的崛起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认为大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除了大寨人的主观努力和陈永贵的

① 张湛彬：《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党史博览》2002年第2期，第4页。

② 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第14页。

③ 李静萍：《潮起潮落——农业学大寨运动回眸》，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454～472页。

④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23页。